

胜利《清人明史学探研》(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从清代明史学的全局出发,就清代官、私两家明史学互为消长的关系,阐述得较为清晰。朱端强《万斯同与〈明史〉修纂纪年》(中华书局2004年版)以万斯同参修《明史》为主线,兼及《明史》修纂的整个过程,对诸参与人员、相关论著、史学思想及官方政策,均有梳理。阚红柳《清初私家修史研究——以史家群体为研究对象》(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以私家群体为视角,对清初私家修史的社会环境、土层分化、发展脉络、史学成就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讨。

21世纪以来出版的史学史专著均不同程度地增入清人南明史研究部分。如傅玉璋著《明清史学史》(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与《中国古代史学史》(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白寿彝主编、向燕南等著《中国史学史·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谢保成主编《中国史学史》第十一编(杨艳秋撰,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对张岱《石匱书后集》、查继佐《罪惟录》、计六奇《明季南略》与《明季北略》、温睿临《南疆逸史》等,都有不同程度的介绍。这说明近年来学界对本课题研究成果的重视、肯定和吸收。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较早对清代南明史研究作一整体性的考察,当属美国学者司徒琳(Lynn Struve)所撰博士论文《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之功用——清代史学史上的南明》(Uses of History in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The Southern Ming in Ch'ing Historiography;美国密歇根大学,1974),惜难寓目。因此,在前辈学者辛勤耕耘的园地,继续于斯役,并从史学理论及史学史之学术路数出发,作一整体研究,以集中梳理清代南明史研究的学术脉络,展示丰富的史学成果,充分突出具有代表性的主要史家及其成就;考察时代与史学间的互动关系,充分发掘清代南明史研究与其时代背景、文化环境、学术风气及官方政策之间的联系;总结清代南明史研究的主要成就和不同特点,得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并揭示史学的特殊价值及其在中国史学上的地位和影响。这些都是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的论题。

“汉唐西域考古:尼雅—丹丹乌里克 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9年11月21—22日,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新疆文物局、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日本佛教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共同主办的“汉唐西域考古:尼雅—丹丹乌里克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召开。来自中、日3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大会收到论文32篇,不久将由文物出版社结集出版。学者们就汉唐西域考古的诸多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收获颇丰。概言之,可分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主题与综论。张玉忠《丹丹乌里克遗址考古的缘起与收获》介绍了该遗址的位置、考察史略、中日合作考古缘起、考古收获等。该遗址中文版发掘报告《丹丹乌里克——中日共同考察研究报告》近日已出版。荣新江《汉唐西域考古百年祭:成就与展望》按地理和历史文化

背景分四个区域(于阗、龟兹、焉耆、楼兰、尼雅、高昌)介绍了百年来汉唐西域考古的成就,并对今后西域考古工作提出了三点期望:调查整理出土的文献文物;将分散各处的文献文物回复到最初出土地点;展开考古与文献综合的历史学研究。小岛康誉《以保护研究世界性文化遗产为使命》介绍了他资助下的中日友好克孜尔石窟修复保存协会、中日共同尼雅遗址学术考察和中日共同丹丹乌里克遗址学术考察的活动概要。

二、考古新发现。巫新华《新疆策勒县达玛沟佛寺遗址的发现与研究》介绍了2002—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在策勒县达玛沟南部发现的三座佛寺遗址——托普鲁克墩1、2号佛寺和喀拉墩1号佛寺,重点介绍了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并分析了该佛寺的特点。此外,文中考证了“达玛沟”地名的来源,认为它来自梵文“Dharma”,正确的汉语译名应该是“达摩沟”。阮秋荣《新疆库车县矿冶遗址考古发掘新收获》介绍了2009年新疆考古所对库车县境内提克买克冶炼遗址和墓地、可可沙依冶炼遗址和贝迪勒克冶炼遗址的发掘成果。提克买克遗址和墓葬的年代为汉代,可可沙依和贝迪勒克遗址属魏晋至唐代。这些遗址反映当时已使用煤炭作为冶金燃料。吴勇《吐鲁番高昌故城考古新发现》介绍了新疆考古所近五年来对高昌故城十七处遗址进行的清理工作,并对高昌故城形制布局方面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

王辉《甘青出土汉代以前中西文化交流的遗物》介绍了近年来甘肃省磨嘴子遗址、磨沟墓地和马家塬墓地出土的一批具有草原文化和西方文化特征的器物。它们是早期东西文化交流的产物,当时文化交流的担当者是羌戎民族。魏坚《居延考古与额济纳汉简》介绍了近几年内蒙古考古所在额济纳旗居延遗址考古调查和发掘的收获,主要包括:确认绿城子遗址为青铜时代遗址;居延地区汉代城址和烽燧障塞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取得重大进展;绿城之南和城东两处共150余座夯土高台建筑遗迹的性质得到确认;对居延地区的唐代遗存予以确认;西夏红庙遗址的发掘收获;西夏黑水城——元代亦集乃路的新认识,等等。贾应逸《兖州隆兴塔鎏金银棺图像与中古于阗佛教》介绍了2008年山东省兖州市兴隆塔地宫出土的一批文物,包括北宋嘉祐八年(1063年)安葬舍利碑、石函、鎏金银棺、佛牙、金瓶、舍利、瓷碗、玻璃瓶等。她认为隆兴塔的这次修建、安置佛舍利鎏金银棺与于阗法藏法师有关,并通过银棺上的纹样考证了于阗佛教信仰中的若干问题。

三、考古研究。林梅村《于阗花马考——兼论北宋与于阗之间的绢马贸易》介绍了西域考古材料和传世书画中的于阗花马形象,指出考古材料中花马形象最早见于6世纪丹丹乌里克佛寺壁画,盛行于8—9世纪于阗彩绘木板画。作者还根据北宋李公麟《五马图》并结合新疆等地出土的考古材料,探讨了北宋与于阗之间的绢马贸易情况。王建新《西域古代游牧文化与农业文明的关系》探讨了西域古代游牧文化不断西迁,游牧文化与农业文明之间的东西互动与南北互动等问题。孙家洲《髹面古俗与阴山岩画补说》一文探讨了“髹面”风俗的特殊内涵、对于北方游牧民族的文化意义、在中原的延续与流变,等等。葛承雍《北朝隋唐引牛驾车胡俑写实现象》研究了北朝隋唐时期一个典型文化现象——引牛驾车胡俑的相关问题,认为引牛驾车胡俑是当时身份等级贵贱的体现,反映了入华胡人多为社会下层役使对象的史实。

吉崎伸《从尼雅遗址93A35(N5)看尼雅的佛教》认为尼雅93A35(N5)不是一处寺院,而是Chjhbo(尼雅地方长官)的私宅,其中的佛教遗迹是将佛堂建在宅邸内的持佛堂。西域南道以前被认为是佛教寺院的建筑中,其实既有出家人的真寺院,也有居士建在私宅内的持佛堂。

张铁男《尼雅遗址 93A27(N37) 建筑遗址的性质与年代》通过分析该建筑遗址的地理位置、出土文书及其他文物标本,认为它是当时一处办理公文和邮驿事务的官署,年代为 3—4 世纪。于志勇《关于民丰县尼雅遗址墓葬出土羊肉及其他》统计归纳了尼雅 20 余座墓葬中随葬羊肉的现象,指出了它反映的一些特点和问题。他还根据 1997 年发掘的 M1 船形棺内随葬河西地区常见的斗瓶现象,探讨了汉晋时期中原丧葬礼仪制度对西域的影响。

安藤佳香《关于西域南道新出土壁画的若干问题》探讨了四个问题:于阗画派“屈铁盘丝”线描问题;如来两肩之上的三角形图案;莲池奇迹中的凡夫俗子;达玛沟 1 号佛寺壁画中确认的笈多式唐草纹。古丽比亚《丹丹乌里克新发现壁画持宝瓶菩萨像的初步认识》通过考察藏传佛教艺术,认为丹丹乌里克新发现壁画中的持宝瓶菩萨像是无量寿佛的形象,并探讨了于阗佛教艺术与西藏佛教艺术的互动关系。赵丰《汉晋新疆织绣与中原影响》从纺织技术的角度分析了新疆地区出土汉晋时期的五种织绣及编织方法:绵线锦绦、绵线平纹纬锦、锁绣、斜编织物和绞编织物。其中,前三种可确定为新疆当地技术,后两种也很有可能为新疆当地采用。这五种类型织物均带有极强的中原丝绸织绣编织法传统,可知中原纺织技术对丝路沿途产生过深远影响。王晨《尼雅古丝绸见证中国汉代丝绸技艺》根据尼雅 95MNI 号墓地 M3 和 M8 出土的 60 余件丝织品探讨了汉锦的织造技艺,重点研究了“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护臂和 M3 出土菱格纹暗花绮长袍的工艺和复原方案。

四、文书研究。辛姆斯·威廉姆斯(Nicholas Sims-Williams)与毕波《尼雅新出粟特文残片研究》释读和研究了 1993 年中日共同尼雅学术考察队发现的粟特文纸残片(93A27FI:3)。这是尼雅遗址首次发现的粟特文书,年代为 3 世纪后半到 4 世纪初。文章还讨论了早期粟特人主要使用丝路南道这一特殊现象,并认为当时丝路南北道之间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直接进行沟通是可能的。段晴《于阗僧提云般若与武则天——兼论〈造像功德经〉》介绍了提云般若及其受武则天诏请入洛阳译经的始末,并对他所译汉文经文与于阗文本进行对比研究,尤以《造像功德经》为重。

张德芳《悬泉汉简中有关西域精绝国的材料》探讨了四枚有关西域精绝国的敦煌悬泉汉简,认为内容反映了至少从西汉宣帝时期到西汉末年西域南道的精绝一直同西汉王朝保持着领属和朝贡关系。王子今《“匈奴西边日逐王”事迹考》考稽史料,对“匈奴西边日逐王”的诸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对悬泉汉简中有关“日逐王”的信息发表了看法。张铭心与陈浩《新出贞元七年和田汉文文书及相关问题研究》释读并研究了作者在北京一位收藏家处见到的一件汉文文书,认为它可能出土于和田地区。文书中含有“贞元七年七月”纪年及“杰谢乡头货里”等内容。

五、科技考古与文保。冈岩太郎《日本壁画修理的现状》介绍了日本壁画修理的历史及作者参加中日共同丹丹乌里克遗址壁画修理工作的相关情况。铁付德《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认为文物保护的根本意义在于把文物蜕变的速度减缓,尽量延长文物存在的时间,对文物采取保护措施时一定要保证今后能够继续采取其他措施的可能性。朱泓、张全超《新疆地区古代居民的体质人类学研究》对新疆出土的人骨和图像材料进行了体质人类学分析,论证了新疆古代居民种族构成的多元化。梅建军、文婧和凌勇《从技术角度看汉代中国铜镜西传问题》概述了新疆和邻近中亚地区发现的中国汉代或略早时期的铜镜,指出它们分布

上的特征。另外,文中报告了其中六面铜镜的科学分析结果,讨论了中国铜镜西传的若干问题。林怡娴《试析尼雅玻璃器的产地来源及相关问题研究》对尼雅遗址出土的玻璃标本进行了分类和统计,报告了其中127件样本的化学成分检测结果,并据此分析了各类玻璃的可能产地。丁焘《西域与中土:尼雅、楼兰等建筑遗迹所见中原文化影响》以尼雅、楼兰等地的木结构建筑遗迹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中原建筑文化对西域的影响。杨林《居延遗址遥感考古调查收获及意义》介绍了2006年国家博物馆考古部等单位对额济纳旗境内的汉代居延遗址及附近不同时代的黑城、大同城、绿城等十余处遗址进行航空摄影考古调查取得的收获。

讨论结束后,专家学者们高度评价了会议取得的成果,赞扬了新疆考古工作人员多年来的辛勤付出,并就新疆考古今后工作中的各方面向新疆文物局局长盛春寿建言献策。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罗帅)

“实践中的唐宋思想、礼仪与制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为了促进研究唐、宋两个断代学者之间的交流,加强唐宋史研究中的资料、方法与问题的沟通,推动唐宋史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清华大学历史系以及中国唐史学会联合主办“实践中的唐宋思想、礼仪与制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唐史学会理事会”。会议于2010年5月28—30日在北京召开,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以及美国、日本、韩国等地的60余名专家学者,以“实践中的唐宋思想、礼仪与制度”为主题,围绕唐宋政治与制度、敦煌吐鲁番文书及《天圣令》、唐宋宗教与祭祀、社会生活、思想文化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会议首先简短而隆重地举行了中国人民大学“唐宋史研究中心”成立仪式。

与会者所提交的论文或研究纲要共50余篇,在研究取向、论题选择、材料运用等方面,都呈现新的意境。会议分专题进行,由发言人讲解,评议人点评。各组评议人针对发言人的观点、材料、思维方法等方面所作的分析、点评乃至质疑,引发了与会者对相关问题更为深入全面的讨论,这也成为本次会议的亮点之一。现将这次会议所涉内容简单介绍如下。

一、“唐宋变革”学说继续显示其持续的魅力,多篇论文围绕此议题展开。刘后滨以宋代告身文书切入,探讨北宋政务运行中的三省制,兼论元丰改制中的三省制理念。王援朝讨论唐宋变革期牧区对政治版图、军事格局、经济、民族诸多方面的影响,认为牧区的得失为唐宋变革一大诱因与表现,中原王朝失去对畜牧业的控制与支撑,决定了后世历史发展的格局。虞云国从文学艺术角度探讨唐宋之际的种种差异,指出唐宋文学艺术新走向具有发展的过程性与辐射性,同时某些新走向具有滞后性,不能为文学艺术的唐宋转型划出统一的下限。赵雨乐利用《新唐书》、《旧唐书》和《册府元龟》、《北梦琐言》互相比照,重点探讨宦官系统内部不同势力的角力,以及基于此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刘光临讨论唐宋间军事战术的转变,从战争方式以及军事动员体制变化角度论述唐宋变革,详细分析城防战取代骑兵运动战的过程,并讨论其与战